

王莽威斗及相关天文信仰问题考察

董 涛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44)

摘 要:王莽统治时期曾铸造威斗,以期厌胜当时愈演愈烈的叛乱以及来自边境的军事威胁。王莽之所以会期待这种基于理念上的努力能够达到实际的效果,是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北斗七星具有神秘的功能,而以北斗厌胜军事也见于当时其他的信仰行为。另外也可以注意到,王莽一直以太一所在自居,并围绕太一建构官职体系,期待百官和民众能够像日月星辰那样有序运行,从而达到天下治理的局面。

关键词:厌胜;五威将;赤星;太一;五石铜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8)05-0014-07

铸造“威斗”是王莽统治中后期比较重要的政治事件,是王莽在面对政治危局的时候采取的理念上的努力。事实上,除了铸造威斗之外,王莽还任命“五威将”巡行四方,并设置“五威司命”,期待通过“威”来慑服人心,压制民众的反叛行为。但显而易见这些努力都是无效的,正如后人所言,“威斗赭鞭,不禳赤伏之运”(《旧唐书·卢藏用传》),也就是说,王莽期待“威斗”能起到“厌胜”的神秘效果,但后来的历史事实却是刘秀宣扬的“赤伏之运”更占上风,王莽的事业最终失败。其实,无论是王莽立“威”,还是刘秀的“赤伏之运”,都可以归属于理念上的努力,目的都在建构自身合法性,后者因应当时盛行的“符命”观念,获得更多的支持;而王莽则是通过铸造威斗,致力于将自身与天文联系在一起,以期获得天命的支持。

一、王莽铸威斗始末

王莽铸造“威斗”的详情,见于《汉书·王莽传》:

是岁八月,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既成,令司命负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铸斗日,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

这一年是天凤四年(17年),此时王莽的事业已经开始全面下滑,其改制非但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反倒给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各地均有民众起兵反叛的情况;而且王莽用兵边境,给国家财政带来极大困难,《汉书·王莽传》记载“天下愈愁,盗贼起”,是对当时局面的真切描述。当时各处都有民众起兵反对王莽统治,例如:“临淮瓜田仪等为盗贼,依阻会稽长州,琅邪女子吕母亦起。”而几乎同时,绿林和赤

收稿日期:2018-06-19

作者简介:董涛(1984—),男,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秦汉史,中国古代思想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汉时期的国家建构、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2017ZDA180)。

眉军也相继起事。其实在稍早之前的天凤二年,王莽就开始用兵西北,《汉书·王莽传》说:“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这些士兵到达北方之后并未立即出击匈奴,而是就地驻扎,但是缺乏有效的约束,给北边并州、平州地区的民众带来极大的痛苦。次年也就是天凤三年的十月,王莽还在西南夷发动军事行动,《汉书·王莽传》载“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尽管在王莽看来,这些战争都有不得不发动的理由,但也因此而形成内外交困的局面,给整个新朝政权都带来极大的困难。天凤三年的时候王莽就承认:“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国用不足,民人骚动”(《汉书·王莽传》),所以此时王莽自然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渡过危局,其中也包括理念上的努力。

根据前引文献的记载,王莽铸造“威斗”主要目的是“厌胜众兵”,可知其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民众起事以及边境军事行动带来的危局,也就是说,王莽期待通过“威斗”的神秘功能,克制各方叛乱给新朝政权带来的威胁。王莽本人亲自参与了“威斗”的铸造,则铸造威斗本身也是一个被赋予极重要内涵的仪式。奇特的是,《汉书·王莽传》记载说铸造威斗这一天“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而此时正值八月,如此严寒的确匪夷所思。有学者注意到,王莽统治时期几乎每年都会有气象异常的情况,其中爆发最频繁的就是低温和旱涝等灾害,而王莽专政的十年中,大约七年都发生了严寒导致的灾害。^[1]这表明两汉之际北方出现了比较严重和集中的降温事件,气候经历了由暖转寒的历史转变。^[2]另外,也有学者从阴阳角度考察,指出极端天气在当时被认为是阴阳失序。^{[3][5]}这提示我们,史料中之所以会留存这则极端天气的记载,显示的是史家对王莽天命的否定,其内在逻辑是王莽虽然铸造了威斗,但仍未获天命认可,是以铸斗日会有严寒天气。

威斗铸造完成之后,王莽一直随身携带,直至身死国亡。《汉书·王莽传》记载“(威斗)既成,令司命负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而王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犹抱持符命、威斗”,可知王莽视威斗与符命同样重要,即同为天命的象征。而后来的史料显示,王莽铸造的威斗似乎不止一件,《南史·何承天传》记载:“张永尝开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铜斗,有柄。文帝以访朝士。”何承天判断这就是新莽的威斗,并说:“王莽三公亡,皆赐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我们认为,何承天的判断未必就不可置疑,王莽赐三公威斗并不见当时史料的记载,而且王莽视威斗极重要,赐予三公陪葬有些难以理解。

另外,为王莽背负威斗的司命应当就是孔仁,史料记载说他因为“敢击大臣”而深受王莽信赖,后来又为捕盗将军帅兵平定五原和代郡的叛乱,王莽或者因此而极为信任孔仁军事方面的能力,所以将象征能够压服各方叛乱的威斗交由孔仁随身携带。据说孔仁“右杖威节,左负威斗,号曰赤星”(《汉书·王莽传》),可见其地位之尊崇。此外,《太平御览》卷681《仪式部》也提到司命孔仁的出行礼仪十分隆重,他乘坐装饰有特殊纹饰的车马,所谓“乘乾车,驾坤马,左苍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些纹饰显然都具有特殊的含义。例如《汉书·王莽传》也记载说:“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鸞鸟之毛,服饰甚伟。”颜师古注引郑氏曰:“画天文象于车也……《坤》为牝马。”孔仁大约是在天凤二年以后担任新莽王朝的司命,《汉书·王莽传》记载说“司命司上公以下”,是具有监察功能的特殊职位,地位十分重要。按照王莽自己的说法,司命携带威节以及威斗,以隆重的礼仪出行是为了“尊新室之威命”,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仪式强化威斗的震慑力以及神秘性。

值得注意的是孔仁“号曰赤星”,赤星也被称为“灵星”“天田”,也就是角宿一,在汉武帝时代是与天神泰一共同被祭祀的神灵,《史记·封禅书》说:“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史记索隐》说:“赤星即上灵星祠也。灵星,龙左角,其色赤,故曰赤星。”汉高祖时代就令郡国设立灵星祠,至汉武帝时代灵星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的诏书提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史记正义》认为灵星即龙星也,并引张晏云:“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

也,见而祭之。”另引《汉旧仪》云:“五年,修复周家旧祠,祀后稷于东南,为民祈农报厥功。夏则龙星见而始雩。龙星左角为天田,右角为天庭。天田为司马,教人种百谷为稷。灵者,神也。辰之神为灵星,故以壬辰日祠灵星于东南,金胜为土相也。”

另外,《续汉书·祭祀志》有“灵星”条,其中提到灵星与农业神后稷的关系,“言祠后稷而谓之灵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旧说,星谓天田星也。一曰,龙左角为天田官,主谷。祀用壬辰位祠之。壬为水,辰为龙,就其类也。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芸耨、驱爵及获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李贤注引《汉旧仪》曰:“古时岁再祠灵星,春秋用少牢礼也。”可知赤星是东方苍龙七宿之一,即角宿一,是与农业活动关系极为密切的星辰,灵星祭祀是汉代官方设置,由郡县基层政府主导举行的礼仪活动,而在祭祀的过程中“县邑令长侍祠”,又有童男十六人舞蹈,则显见的祭祀灵星是县级地方政府的重要活动,灵星在民众中的重要地位也就可得而知了。王莽时代孔仁作为司命,号曰“赤星”,应当同样是为了尊崇其地位,巧妙借助了灵星在民众中的影响力。

种种迹象表明,王莽对“威”有着特殊的喜爱,班固曾经推测王莽当时的心态,所谓“莽以诈立,心疑大臣怨谤,欲震威以惧下”,这种推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取得政权之初,王莽希望尽快确立权威以使天下民众倾心悦服,所以在代汉立新以后,王莽就命“五威将”巡查四方,颁布符命,《汉书·诸侯王表》说王莽“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王莽传》也说:“(始建国元年)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五威将有十二人,而“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所以说五威将帅一共有七十二人。王莽任命十二个五威将前往天下巡视,可知王莽将天下分为十二个主要方位,对应的应当是十二地支,这也同样是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行为。

王莽在对五威将帅的策命中说:“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希望他们将新朝的符命颁布于天下,同时“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即希望包括原来汉朝统治下的子民,以及匈奴、西域在内的“徼外蛮夷”,都接受新莽王朝的统治。这种行为具有很强的象征性,王莽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使新朝能够得到天下臣民的认可,也意味着新朝取代了汉朝,建构起新朝的合法性。这其中符命是最根本的内容,王莽期待民众相信自己得到了天命,所以对此极为重视,后来王莽意识到符命泛滥,仍然规定“非五威将率所班,皆下狱”,即以五威将帅颁布的四十二篇《符命》为准。

此外,五威将帅还更改所到之处王侯以下及吏官名称,并贿赂单于更换玺印,并因此而引发了匈奴的不满。王莽在位期间大规模更改各地地名以及职官名称,其中颇有威服厌胜的含义,尤以更改边境地区地名为甚,例如改天水郡为填戎,改蓟县为伐戎,改陇西郡为厌戎,以及改雁门郡为填狄,改北地郡为厌狄,改白狼为仇狄,改武要为厌胡,改平邑为平胡等等。可以认为,王莽期待通过更改地名,达到厌胜的效果,这同样是一种理念上的努力,主要在于解决边境地区的少数族政权的军事威胁。而五威将更改匈奴印,引发了匈奴的不满,并由此导致北边的军事威胁加剧,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了。

《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说:“王莽置五威将军,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虽然“五威”本身就具有厌胜天下的使命,但从当时的记载来看,五威将帅更像是一支宣传队,他们所到之处除了颁布新莽王朝的符命之外,还“行天下风俗”,其中就包括礼敬贤人等。《汉书·两贡传》记载,龚胜年老之后回到乡里,五威将帅“亲奉羊酒存问”,目的在于通过这样的方式争取士人以及普通民众对新朝的支持。由于现实政治方面的原因,班固在《汉书》中更多保存了不愿意在新朝为官,隐居不仕的士人资料,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王莽应当是获得了当时士人以及民众较为广泛的支持,这其中原因众多,但五威将帅的努力应当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总体而言,从取得政权之初即派遣五威将巡行天下厌胜四方,到后来铸造威斗以期“厌胜众兵”,王莽对立威的需求是始终贯穿其中的。正如前人所言,王莽取得政权合法性存疑,其反对者始终在帝国内部存在,王莽期待通过各种方式来增强自身政权之“威”,以求得民众的接受和认可。从历史资料的记

载来看,王莽早期还期待通过一些具体的务实性策略来提升自身的威望,但到后来情势急转直下,王莽的努力实际上收效甚微,不得不更多期待借助“威斗”的神秘力量。那么,威斗为什么被认为具有神秘力量呢?

二、威斗与“斗”

威斗神秘力量的渊源来自于作为天文星象的斗,而单由名称可知,王莽“威斗”与“斗”有莫大关联。北斗七星的形状与作为量器的斗大致相同,前者可能就是因后者而得名,例如《说文解字》“斗部”说:“斗,十升也,象形,有柄。”段玉裁解释说:“斗有柄者,概象北斗。”北斗七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大熊星座,《史记·天官书》说:“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李约瑟提到,戴遂良和德效骞都认为“斗”是指大熊星座本身。^{[4]272}因为北斗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象征意义,所以王莽威斗的名称应该是由北斗而来,但可以推论,王莽等人是仿照当时常见的量器斗的形状铸造了“威斗”。

前文曾经提到《南史·何承天传》记载“张永尝开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铜斗,有柄。文帝以访朝士”,何承天判断这件就是王莽时期的威斗,并指出“王莽三公亡,皆赐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时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为大司徒,必邯之墓”。何承天的判断很快得到证实,据说当时墓葬内又出土了一件铜斗,并且有“大司徒甄邯之墓”的石碑,证明确实是甄邯之墓。铜斗有柄很容易令人想起现在能够见到的王莽时期铸造的作为量器的斗,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有一件王莽始建国元年铜方斗,呈正方形,有短柄,通长21.5厘米,斗身每边长13.81厘米,高10.8厘米,斗内深10.4厘米。斗口横刻铭文“律量斗,方六寸,深四寸五分,积百六十二寸,容十升”^[5]。事实上,有学者就认为威斗的形状可能大体如此,例如李家浩认为威斗与圆腹,平底,宽口沿,长直柄的熨斗相同,只是威斗长二尺五寸,比这件普通铜方斗大两倍左右。

到宋代,有人认为“威斗”就是王莽铸造的用作量器的铜斗,例如王楙《野客丛书》引《避暑录》载韩玉汝家有王莽铜斗,“状如勺,以今尺度之,长一尺三寸”,并认为王莽威斗即玉汝家所藏铜斗。只是这则史料真实性是应当存疑的。

正如前文所言,人们很早就发现北斗七星的运转与时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史记·天官书》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斗为帝车”的观念在汉代十分盛行,在山东武梁祠画像石中就出现了“斗为帝车”的拟人化形象。《春秋元命苞》说:“北者,极也;极者,藏也。言太一之星高居深藏……斗为帝令,出号布政,授度四方,故置辅星以佐功。斗为人君之象,而号令之主也。”北斗七星绕北极星旋转,因而被人们形象地想象成为“帝车”“帝令”。而且人们可能很早就认识到,北斗七星的移动和四季有密切关系,例如《鹖冠子》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后来人们又根据星空中二十八宿的排列,创设二十八时制,北斗因此也就具有了指示一日之内的时间的功能。可能也正因此,北斗才被《史记·天官书》认为有了“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的神秘特征。

史料记载,王莽对“时日小数”十分信赖,史书中也常见王莽择日的记载,是知王莽极为信赖时间的神秘含义。至穷途末路之时,王莽曾经借助式盘的旋转,以论证天命就在自身,《汉书·王莽传》载:

时莽绀袍服,带玺绂,持虔帝匕首。天文郎按栢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

“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这里天文郎操作的就是式盘,对于这件器物前人已有较为具体的研究,此不赘述,但应当注意其核心内容其实就是北斗七星。而式盘具体使用方式是,根据当时所用的二十八宿纪日法,天文郎根据时间旋转斗柄,王莽则根据斗柄的指向更换自己座位所在的方位。显然王莽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人观念中,北斗与军事活动关系密切,这可能也是王莽使用威斗厌胜众兵的一个主要原因。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有一件《太一避兵图》,最早发表于《文物研究》1986年第2期,此后有周世荣《马王堆汉墓的“神祇图”帛画》、李零《马王堆汉墓“神祇图”应属避兵图》、李家浩《论〈太一避兵图〉》、连劭名《马王堆帛画〈太一避兵图〉与南方楚墓中的镇墓兽》等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李零认为,太一代表的是北斗,可以与北斗互代,位于北方,五行属水,与南方之龙相对。李家浩认为太一是斗极所在,是天神最尊者。所谓“避兵”,指的是避免在军事行动中受到伤害,也是一种厌胜方术。避兵图中北斗占据主要位置,可知北斗与军事的关系。另外,汉代的“灵旗”也绘制有北斗形象,也可证明北斗与军事活动有关。《史记·封禅书》记载:“其秋,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太史奉灵旗指所伐之国,其意也在厌胜。《汉书·礼乐志》说“招摇灵旗,九夷宾将”,颜师古注云“画招摇于旗以征伐,故称灵旗”,所以可以认为灵旗之上虽绘制有日、月、北斗以及龙等诸多形象,但与避兵图类似,北斗所占的位置也比较重要。招摇是北斗第七星,通常借指北斗七星。北斗的形象在汉武帝时代国家军事征伐活动中的地位,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

另外,北斗与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有关。《史记·天官书》说:“兵征大宛,星弗招摇。”《正义》云:“招摇一星,次北斗杓端,主胡兵也。占:角变,则兵革大行。”《汉书·天文志》也说:“太初中,星孛于招摇。《星传》曰:‘客星守招摇,蛮夷有乱,民死君。’其后汉兵击大宛,斩其王。招摇,远夷之分也。”这里说的是招摇与“胡”或者“远夷”的军事活动相关,而联系前文所述,王莽厌胜的主要对象是匈奴、西域以及西南夷,因而王莽铸造威斗以厌胜的用意也就十分明显了。

北斗七星围绕北极旋转,这是人们早已观测到的天文现象,而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王莽每每以太一自居,同样是为借助天文神秘自身的努力。例如前文提到王莽命五威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五威将是王莽派往各地的使者,自称“太一之使”,一方面神化自身,另一方面也暗示王莽就是以太一自居。前文也提到,“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汉武帝时代人们认为“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所以在祭祀太一时“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自武帝时代开始作为最高神灵接受祭祀,而且被认为是居住在北极最亮一星,至王莽时代显然已经深入人心。而王莽一直追求自身居于天下之中,甚至一度打算将都城迁到洛阳,那么对天文星象中居于正中的北极以及太一神,当然会有极为浓厚的信仰。

据记载,始建国元年,王莽策命群司,并对他们的职能进行了划分,其中提到“岁星司肃,东岳太师典致时雨”,另外南岳太傅、西岳国师、北岳国将分别对应荧惑、太白、辰星,司徒、司马和司空三公分别对应太阳、月亮和北斗。而日月五星和北斗显然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运转,那就是北极,也就是太一所常居之处。可以注意到,王莽其实就是根据天文现象划分职官,北斗与日月星辰皆围绕北辰运行,而王莽居于正中,这正符合王莽对天下秩序的想象。

除了太一之外,黄帝也受到王莽的尊崇,例如《汉书·王莽传》提到天凤六年春,王莽见天下盗贼难以抑制,就下书说:“《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后来王莽再次提到《紫阁图》中关于太一和黄帝的记载,他说:“伏念《紫阁图》文,太一、黄帝皆得瑞以仙,后世褒主当登终南山。”史料记载当时大风吹毁了王路堂,也就是未央宫前殿,王莽一度十分沮丧,他在诏书中说:“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可以看出王莽一方面坚持认为灾异是来

自上天的告诫,表明自己仍然是得天命,但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弃世升仙的想法,这是以前王莽思想中很少被关注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晰观察到王莽对于神仙信仰的心路历程,即从始建国初年以太一之使,到后来官职设计时以太一位自居,再到天凤年间事业下滑,向往黄帝和太一升仙,开始流露出弃世的想法。

王莽以及当时的一些人之所以会认为威斗具有“厌胜众兵”的功能,不仅是因为他们认为威斗具有来自上天的力量,而且还与汉代人的五行观念有关。首先,王莽制作威斗的材料是“五石铜”,这一选择可能考虑了五行观念。关于“五石铜”,颜师古注引李奇曰:“以五色药石及铜为之”,并说王莽的威斗“若今作鍮石为之”(《汉书·王莽传》)。颜师古说的鍮石也就是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唐代多用于制作佛像、车马具以及其他装饰品。也就是说颜师古认为王莽铸造威斗采用了合金的方式。李约瑟认为,威斗很可能是“用外壳包玻璃的青铜制成”,他还认为出现在《周易参同契》和《抱朴子》中的“五色石”也很可能是玻璃,并不排除工匠们在融化了的金属中加入一些磁铁矿的可能性。综合颜师古和李约瑟等人的看法,可以认为威斗的主要材料是铜,在铸造过程中加入了其他合金成分“五石”。所谓“五石”,也可作“五色石”,可能来源于“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观念(《淮南子·览冥》),与当时方士炼制丹药使用的五种颜色不同材料或许也有所关联。另外《论衡》卷二《率性篇》说:“道人消炼五石,作五色之玉……消炼五石,铸以为器。”黄晖校释引《抱朴子》说“五石者,雄黄、丹砂、雌黄、矾石、曾青也。”另引《金丹篇》说:“五石者,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也。一石辄五转,而各成五色。”是以知五石确可铸造器皿,且五石、五色石等名异实同。

而根据后世资料的记载,当时除了威斗之外,另外还铸造了一把“神剑”,也使用了“五石”。《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兵部”载:“新室王莽在位十八年,建国五年庚午造威斗及神剑,皆炼五石为之,铭曰:神圣万国伏。小篆书,长三尺六寸。”金木水火土五行在古人看来是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女娲补天的五色石代表的是古人观念中世界上所有的物质,这一点对于解读王莽威斗中加入五石合金的象征意义或许有所帮助。

三、结论

总而言之,王莽铸造威斗是在国势转危的时候采取的理念上的努力之一,应当认为,王莽并非没有尝试过以实际有效的手段解决问题,但这些手段由于各种原因都缺乏可行性,这些直接导致王莽统治后期情势愈演愈烈。整体上来看,越是到统治后期,王莽进行的理念上的努力就越多,以至于民众对此的态度逐渐由怀疑转为嘲讽,就更谈不上能够有什么实际效果。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王莽的这些行为在当时也有一定的信仰基础,例如就铸造及使用威斗而言,王莽实际上是想要借助来自天文的神秘力量,厌胜境内的背叛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不仅如此,从当时的记载来看,王莽对天文的信仰还包括了模拟天文建构官僚制度体系,以自身居于北极星所在的位置,期待百官以及民众能够像天文星象那样有序运转,并最终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局面。可以发现,终王莽之一生,都没有放弃过这样的努力,所以本文认为王莽并非仅仅是以这样的方式取得民众的信赖,他本身也对此具有较为浓郁的信仰,这是我们观察王莽思想必须留意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1] 王子今.《南都赋》自然生态史料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3).

- [2] 王子今. 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J]. 历史研究. 1995, (2).
- [3] 姜守诚. 《太平经》研究——以生命为中心的综合考察[M]. 北京: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4]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 [5] 罗福颐, 唐兰. 新莽始建国元年铜方斗[J].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58, (1).

Wang Mang' Weidou and the Astronomical Belief

Dong Tao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Wang Mang, he forged a Weidou to overcome the growing rebellion and military threats from the border. The reason why Wang Mang expected such ideological efforts to achieve practical results was that the Big Dipper had a mysterious function in the eyes of the people at that time, and the belief that the Big Dipper bore military defeat was also seen in other beliefs at that time. In addition, it can be noted that Wang Mang has always believed that he is the Taiyi, and around Taiyi to build a system of official position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like the sun, moon and stars, so as to achieve the situation of world governance.

Keywords: Yansheng; Wuweijiang; Spica; Taiyi; five stone copper

[责任编辑: 朱丕智]